

论山谷诗

丁 夏

—

宋诗大家中,黄庭坚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他的山谷诗在两宋诗坛开宗立派,其追随者之多,对宋诗演变影响之大,两宋三百年间无人出其右;二是对山谷诗的评价歧见纷陈,其间褒贬悬隔,争议之激烈,也为宋诗中所仅见。这两点,第二点为人们所公认,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第一点。

庭坚在宋诗中可谓名声显赫,而最为后人所重视所乐道的莫过于他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长期被并列为宋诗的主要代表和最有影响的诗人,清人王士稷有两句诗:

“一代高名孰主宾?中天坡、谷两嶙峋”,^①特别表示对苏、黄并力推重,不作轩轻。然而,如果结合宋诗演变考察苏、黄之称,不能不看到下面的变化:当苏、黄并称初起之时,苏轼诗名居庭坚之上;而在苏、黄之称流行以后,庭坚对宋诗的影响却超过苏轼。苏、黄齐名然而各自影响并不相当,是宋诗演变过程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我们先看苏、黄并称初起之际的情况。苏、黄齐名出现在北宋元祐末年^②。在元祐年间,苏轼是诗坛无可争议的领袖,庭坚则与秦观、陈师道等人集合在苏轼门下,合称“苏门”诗人。“苏门”中唯山谷诗得与东坡诗并称,出自苏轼和“苏门”中人对山谷诗再三的奖掖推崇。元祐以前,苏轼激赏山谷诗就已震动诗坛,传遍士林,晁补之有诗叙述熙宁十年苏轼当众吟诵山谷诗的情景:“湖州太守诸儒长,可独进贤无上赏;曾语黄公四座惊,竞吟佳句汶阳城。”^③进入元祐年间,庭坚在“苏门”弟子中已卓然挺出,同门友诗题中将他与苏轼并列,誉为“后来得濬冲,他人孰窥藩?”^④当时人《寄鲁直学士》诗也说:“当今文伯眉阳苏,新词的砾垂明珠;我公江南独继步,名誉籍甚传清都。”^⑤苏、黄并称遂因此形成。不过,在时人眼里,苏、黄齐名而彼此仍高下有别,南北宋之交的史家在庭坚传记中就特附一笔:

始庭坚与秦观、张耒、晁补之皆游苏轼之门,号四学士,而庭坚于文章特长于诗,独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谓之苏、黄。^⑥

强调“独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以表示公论中苏、黄地位有别,苏在黄之上。其实庭坚本人也反复表示师事苏轼,晚年犹云:“(余)作诗在东坡下,文潜、少游上。”^⑦

再看苏、黄并称后各自的影响。吴炯《五总志》说苏、黄之称形成后:

……学者因生分别,师坡者萃于浙右,师谷者萃于江右。以余观之,大是云门盛于吴,临济盛于楚。

可见当时苏、黄各自拥有一批追随者，且分布在不同区域。“师坡者萃于浙右”，与苏轼多年在江浙一带任职有关；同样，“师谷者萃于江右”，也因庭坚本江西人。两派都是自然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成就不同，吴垞接下来讲：

云门老婆心切，接人易与，人人自得，以为得法，而于众中求脚跟点地者，自无二三焉；林济棒喝分明，勤辨极峻，虽得法者少，往往崭然见头角，如徐师川、余荀龙、洪玉父昆弟、欧阳元老，皆黄门登堂入室者，实自足以名家。

说明当时师法山谷诗一派诗名更高。当师法山谷诗一派在北宋末年诗坛声誉渐起的时候，吕本中把一批“源流皆出豫章”的诗人称为“江西宗派”，仿禅宗宗派，尊庭坚为诗派宗主，而视诗派其他人为庭坚的“法嗣”、“后学”。江西诗派成员不限江西人，它的确立标志着山谷诗已产生广泛的影响。江西诗派主要生活在北宋末年，而声势大著则是在南宋初年。由江西诗派带动，南宋初诗坛诗法山谷诗形成时尚，蔚为风气，当时人胡仔说：

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今少陵之诗，后生少年不复过目。^⑧

“江西”即庭坚，南宋初人专学山谷诗，沉溺其中，竟连宋人尊之已久的杜诗亦置之不顾，表明山谷诗影响当时何其炽热旺盛！将此时风尚同前引《五总志》所述北宋末年情况相比，可以看出山谷诗影响在几十年间的渗透扩展，构成北宋末南宋初宋诗演变的内在走向。这一时期诗坛特点，钱钟书先生曾用一句话来概括：“北宋末南宋初的诗坛差不多是黄庭坚的世界”。^⑨钱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师法山谷诗的风气不局限在宋人境内，而是超越国界，蔓延到金国，尽管金人诗论中显著表现出尊苏抑黄的倾向，创作上师法山谷诗的痕迹却宛然可见。^⑩北宋以后东坡诗影响留滞中原未曾南渡，前人已有“苏学行于北”的总结^⑪，钱先生的考察启发我们补充一句：山谷诗不仅大盛于南，亦潜行于北，其影响在南宋初年已在整体上明显超过了东坡诗。苏、黄齐名而影响分流、小大有别的局面从此形成。

此后，随中兴大家尤、杨、范、陆的崛起，尤其是继“四灵”标榜晚唐诗之后，山谷诗影响在南宋中后期逐渐收缩，但宋人中庭坚“法席独盛”的格局，终南宋之世，无根本改变。^⑫苏、黄之称仍流行于世，而一些晚宋人已在其中赋予新的内涵。林希逸《读黄诗》云：

当时姓名比明月，文莫如苏诗则黄。

他并没有忘记庭坚出自“苏门”^⑬，然而他将苏、黄并称，各有所重：苏轼代表散文正统，庭坚则是诗歌正宗。同时人谢枋得《与刘秀岩论诗》书，谓学诗当有所侧重，由古而下，首举《诗经》、杜诗，至宋人则“首选黄山谷、陈后山两家诗，各编类成集，此二家乃本朝诗祖”，继而将东坡诗与昌黎诗归为一类：“次选韩父公、苏东坡二家诗编类成集”，韩愈在宋代恰是文名远过诗名，被视为古文正宗然而是有争议的诗人^⑭。此外，晚宋人在苏、黄之外，又称黄、陈，即把庭坚与最早标榜师事庭坚的陈师道并称，黄、陈被谢枋得尊为“本朝诗祖”，在他之前戴复古则用黄、陈与李、杜对举^⑮。黄、陈之称的出现和流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黄齐名后山谷诗是如何“法席独盛”。

指出山谷诗在两宋诗坛影响特出，是对文学史上一种现象的澄清和确认。影响特出

本身不足以证明山谷诗创作成就同时也称雄两宋，凌跨诸家之上。文学史上，某些生前或死后一段时间有着极大影响的诗人，并不就是后世公认的他那个时代成就最高的诗人；杰出甚至伟大的诗人也许恰恰在生前或死后一段时间里影响有限，例如陶渊明和杜甫就是如此。但当时极有影响的诗人，一般说来也同时得到时人的普遍推崇。庭坚的情况却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如本文开篇所言，山谷诗在两宋既有莫大影响，又引起空前激烈的争议，而且这两点交叉并行。例如当南宋初山谷诗影响弥漫天下之际，时人对山谷诗的评价却是“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⑥，形成抑扬两派意见的尖锐对峙。一个自身评价充满争议的诗人何以同时又是一个产生莫大影响、以致无人可取代其特出地位的诗人呢？面对这样令人困惑的问题，需要联系宋诗演变探讨山谷诗的特色，分析它所以“法席独盛”的原因。

二

前人对山谷诗特色和它在宋诗演变中地位比较全面的论述，首推南宋刘克庄下面一段话：

国初诗人如潘朗、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刘又专为昆体，故优人有捋撻义山之讥。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极其天才笔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摩，不易之论也^⑦。

其说在后世很有影响。如清初吴之振等编《宋诗钞》，撮其要旨、稍加补充草成“山谷诗钞小序”；翁方纲《石洲诗话》引录其文，再加解释；直到建国后文研所编《中国文学与史》，犹加引录，认为其中透露了山谷诗产生莫大影响的原因，继而引出对山谷诗特色的评论^⑧。因此，这段话可视为历来山谷诗评论中有代表性的批评。

然而，这段话有其明显失误，实不足为据。

首先，刘克庄历数北宋诗人，至庭坚而譬之“达摩”西来，尊为“本朝诗家宗祖”，意指独具特色的宋诗成于庭坚之手，这有悖于事实。宋诗从因袭晚唐诗风到形成自己的特色，经历了长时间发展演变。宋诗的特色，克庄同时人严羽概括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而在这三方面，庭坚均非始作俑者。以文字为诗不论指以散文笔法入诗还是指在诗中玩弄文字游戏，其风气非庭坚所开，而当以苏轼更有代表性^⑨，轼长庭坚八岁，诗名成就在庭坚之前；以才学为诗或许应上溯到宋初昆体诗人，这些馆阁词臣为诗号称学李商隐，而专事组织词藻、镶嵌典故，到了欣赏义山诗又“无书不读”的王安石和才富学博的苏轼手中，以才学为诗已流为风气，而安石大庭坚二十余岁；以议论为诗，更是早于庭坚四十年左右的梅尧臣、欧阳修和苏舜钦开创的时尚。庭坚是宋诗的主要代表，但他并没有为形成宋诗特色奠基。

其次，刘克庄独评庭坚为诗“锻炼勤苦”，他漏掉了在庭坚之前同样以句锤字炼名世的王安石^⑩。又，称庭坚“会粹百家句律之长”两句，当系仰承吕本中之评，而吕评

南宋初已遭张戒、胡子有理有据的反驳^①。至于“搜猎奇书”五句,应该说确为山谷诗特色。问题是刘克庄叙述中割裂了山谷诗与当时诗坛风尚的紧密联系,其实,王安石诗已有不少取自史书道藏的冷僻词汇^②,苏轼也广搜“故实小说”、“街谈巷语”入诗^③,看到这些再回过头体会刘克庄所说的山谷诗特色,就很难说它为庭坚所独辟专有,毋宁说是诗坛风气的一种具体表现。

刘克庄评论的根本缺陷可称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的眼里只有“法席独盛”的山谷诗,对山谷诗又局限于观察某些艺术手法技巧,因此既不能全面把握山谷诗特色,也未曾真正揭示它产生莫大影响的原因。当我们从内容到形式、由创作联系理论主张对山谷诗进行整体考察,并将庭坚和同时诗人加以比较时,可以看出,以其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适应北宋后期党争愈演愈烈的气氛,从思想内容深层与正在勃兴的理学思潮形成交流共鸣,在宋诗已具特色后继续致力于诗歌形式、表现方法的开拓创新,构成山谷诗特色的主要内涵。具有这样丰富的内涵,山谷诗以全面代表北宋后期诗歌演变趋势的姿态崛起于诗坛,产生莫大影响,乃是宋诗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党争是北宋后期社会中心事件,它不仅改变了此前北宋政局相对稳定局面和向后影响到南宋政治格局,且直接给当时士大夫命运和诗文创作以巨大冲击。党争起于统治集团内部革新派和守旧派政见分歧,演为复杂激烈的派系倾轧,统治集团从此四分五裂,随双方势力交错升降,继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轮番贬谪。庭坚晚年有两句沉痛的诗:“三十年来世三变,几人能不变鹑蛙?”^④概括了生活在政局反复动荡、贬黜频仍中的士大夫普遍的人生遭遇。而围绕党争,宋诗前后有明显变化。嘉祐末年以后士大夫不满现状力图有所作为的心理^⑤,蓄积近十年,随熙宁二年党争爆发而达到亢奋状态,借诗文描写国情、议论政事在在皆是,当时的宋诗因而洋溢着参予政治的热情。由于党争持续绵延,愈演愈烈,尤其是元丰年间出现苏轼“乌台诗案”,文字狱被用作迫害政敌的手段,以诗文论罪、攻讦告发之事一起再起^⑥,于是人人自危,害怕因诗文成祸的心理滋生蔓延,宋诗在一度异常贴近政治斗争之后,逐渐脱离党争漩涡,乃至回避政治。

从当时其他诗人身上也可看到前后变化,如王安石早年多政治诗,晚年转写山水诗;苏轼诗中曾大量批评新政,贬谪后多少收敛锋芒,不过,山谷诗最能代表宋诗脱离回避政治斗争的方向。同王、苏相比,山谷诗一开始就较少政治色彩,很少触及政治题材。庭坚政治上与旧党同命运共进退,熙、丰年间却只写过聊聊几首批评新政、声援旧党的诗^⑦。元丰八年后旧党当政,元祐之政以全盘否定新政、罢黜新党为中心,而庭坚少数几首言及党争的诗歌,却特具温和态度。与友人唱和诗中,再三主张兼用双方人才,调停派系倾轧:“人材包新旧,王度济宽猛”^⑧,“秦收郑渠成,晋得楚材多”^⑨;也反对一概否定安石之学:“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⑩,《次韵荆公题太乙宫壁》更表现心中的迷惘:

风急啼鸟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

任渊注末二句诗意说:“在熙、丰则荆公为是,在元祐则荆公为非,爱憎之论,特未定也”,道出了庭坚心曲。庭坚政治上与苏轼同党,诗歌上互致推崇,但山谷诗较少触及

时事政治，苏轼欣赏之余有“无补世用”之评^⑩；庭坚则认为“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⑪，表明苏、黄不仅创作倾向不同，论诗侧重面也不一样。最能体现庭坚诗歌主张的，是他的《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

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为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

从其中可看出，庭坚反对以“好骂”为诗，直接理由是为了适应文字狱频起的现实，避免以诗文取祸；更深刻的根据则是儒家传统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的“诗教说”，他要用“诗教说”来确立诗歌的创作原则和风格规范。这种主张，与他创作中很少直接议论政治及持论温和的倾向是一致的。在严酷的党争中，东坡诗“语多怨刺”已使很多人警惕^⑫，山谷诗“世事更忘机”的特点则被誉为“无一点尘俗气”^⑬。外甥洪炎在《退听堂录序》中特别指出庭坚诗歌“忠义之气蔼然见于笔墨之外”，而不同于杜甫“三吏”、白居易《秦中吟》那种“几于骂”的诗歌。南宋人也正从这点断定苏、黄之别：“山谷浑厚，坡似不及。”^⑭庭坚确定的不以骂詈入诗的原则，在晚宋批评山谷诗的论家眼里也还是不可动摇的，这颇能说明东坡诗后继乏人、山谷诗“法席独盛”的原因^⑮。

北宋后期又是理学形成的时期。理学以传统儒家学说为根本，兼取佛、道，融为一体。其核心乃是“性理之学”，无论本体论、认识论、政治论，落脚点都回到人的道德修养伦理规范上来。北宋理学家如周敦颐讲“立诚”、“无欲”，张载讲“存心养性”、“存天理灭人欲”，二程讲“进德修业”、“安于义命”，诸说不同，而莫不指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体验认同。理学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哲学从传统经学走向穷性尽理、修身养心之学，是哲学思想的重大转折。

庭坚并非理学家，但他对理学家抱有特别的敬意。当周敦颐尚未名世之时，是庭坚最早在诗中对他作了高度评价，《山谷诗别集》卷一《濂溪诗序》说周“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几句后世传为理学家话头。庭坚也倾慕二程的道德学问。庭坚推崇理学家，由人格倾慕联系到诗歌创作，《濂溪诗序》说：“茂叔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邱壑，故余诗词不及世故，犹仿佛其音尘。”“不及世故”表现为较少触及社会政治题材，从另一方面看则表现在收使视听，进入心灵世界深层，把人生放在道德修养和处世哲学的层次上展开描写，从思想内容与理学思潮形成交流共鸣，是山谷诗又一显著特色。山谷诗中谈及修身养性篇幅之多，所占比重之大，为其他诗人诗中所罕见。在他看来，修身养性不仅与诗文创作有关，而且是成就与否的根本所在，《书旧诗与洪龟父跋其后》云：

龟父笔力可扛鼎，它日不无文章垂世。要须尽心于克己，……全用其光辉照其本心。力学有暇，更精读千卷书，乃可毕兹能事。

类似的说法在集中比比皆是^⑯。侈谈修身养性，乐而忘返，在山谷诗中引人注目。如“养心去尘缘，光照生虚室”^⑰，“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⑱“虚心观万物，险易

极变态；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④，“要须心地收汗马，孔孟行世日杲杲”^④，并以养性之道示人，《赠张叔和》诗：

我提养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赠君。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团蒲日静鸟吟诗，炉薰一炷试观之。

其中“四印”，正所谓“安于义命”，末两句所言正是理学家“内省”、“静坐”的功夫。庭坚注重“存心养性”，淡泊名利，不为荣辱所动，备受时人推许，晁补之《题鲁直高求父扬清亭诗后》谓：“鲁直于怡心养气，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洪炎《退听堂录序》更因此高度评价山谷诗：“其发源以治心修性为宗本，放而至于远声利，薄轩冕，极其致，忧国爱民。”到了理学昌盛的南宋，时人评论庭坚也说：“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瓌伟之文，妙绝当世”^⑤，而历来对山谷诗最高评价，莫过于理学名家陆九渊：“豫章之诗，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夫精到，虽未及古之源委，而其值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开辟以来能自表见于世若此者，如优钵昙花，时一现耳”^⑥，可见山谷诗盛行的背景。

北宋后期，宋诗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庭坚前后，大家名家群起辈出，有如群星荟萃。山谷诗某些特色，如好使事用典、间有议论等，与当时诗坛风气相通。值得注意的是庭坚在时人中特别表现一种创新意识，每言“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④，“文章最忌随人后”^⑤，“我不为牛后人”^⑥，反映在创作和论诗上，是在形式、技巧上多所探讨，力辟新路。例如认为写诗应讲究章法布局^⑦，应广学前人，众采诸家之长^⑧，以为“句中有眼”，主张炼字^⑨，等等，而尤有影响的则是“拗体”诗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主张。庭坚大力作“拗体”诗，是继北宋诗坛先后流行平易流畅的白体、属对精工的五七言之后，在律诗形式方面别开生面。“拗体”诗有意打破律诗原有的平仄规范，运古入律，于不和谐中求得顿挫抑扬的变化节奏美感。“拗体”诗在当时诗坛引起极大反响，张耒甚而将“拗体”视为庭坚所首创，说：“以声律作诗，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诗人谨守之。独鲁直一扫古今，直出胸臆，破弃声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钟磬声和，浑然有律吕外意。近来作诗者，颇有此体，然自吾鲁直始也。”^⑩其实“拗体”是师承杜甫“吴体”而来，但时人或不辨其中渊源，而称之为“奇律”。^⑪南宋人学山谷诗，尤热衷于“拗体”，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说庭坚“拗体”诗“不拘声律，亦清新奇峭之极也”，又说“近时学其诗者，……每有所作，必使声韵拗捩，词语艰涩，曰江西格也。”以致南宋中后期人学江西诗，仍重“音节聱牙”^⑫，足见影响之久远。至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主张，是在前人尤其是王安石、苏轼等人创作技巧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⑬。结合庭坚创作实际，可看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有两层含义：首先是以师法前人诗歌句法、字面为创作基础，其次是对前人句法、字面加工改造，或将典故成语置于新的语言环境中，使其具有新的含义，获得字面虽旧、命意全新的效果^⑭，或借前人句法而另铸新词^⑮，或模仿前人诗意而加以变化^⑯。在中国古典诗歌里，重视师法前人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传统，进入宋代以后，师法前人更成为自觉意识并因此而形成了各种流派，如“白体”取法白居易，“晚

唐体”师事晚唐诗，“西昆体”宗尚李商隐。各派辗转模仿之际，每因师古不化摹拟痕迹太重而为人诟病^⑤。在这种背景下，“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论的提出，意在师法前人基础上翻进一层，力求有所创新，因此其论一出，即广受欢迎，两宋人诗话中每每对它加以讨论，乃至煽起南宋人专事堆砌典故的风气^⑥。而在山谷诗崛起之际，人们感受最深的还是庭坚的创新意识，吕本中将苏、黄并称，然更推重庭坚的学古善变、富于创新^⑦。可见山谷诗影响极大，与庭坚锐意创新有直接关系。

三

分析了山谷诗特色和它所以产生莫大影响的原因之后，剩下的是对山谷诗创作成就的评价。庭坚号称宋诗大家，其山谷诗影响之大，雄视有宋一代；而就创作成就言之，平心而论，庭坚既不如北宋的苏轼，也不及南宋的陆游。山谷诗不如东坡诗，在格局较小，气势较弱，庭坚自己说己诗与东坡诗区别：

我诗如曹邻，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⑧。

虽是戏谑出之的谦词，倒也贴切彼此的差异；山谷诗尤乏东坡诗行云流水、自然奔涌之姿，同时也不象东坡诗那样蕴含着北宋后期社会现实生活的广阔画面。至于放翁诗，出以身许国志士仁人之手，得时代风云之助，壮士抒怀，慨当以慷；英雄失路，沉吟悲凉，可说是以一己之诗而唱出南宋一世之人的忧愤希冀，惊顽起懦，自非山谷诗所能比拟。建国后评价宋诗，首推苏、陆成就最高，其论堪称公论，亦当是定评。

不过近几十年来山谷诗成就评价中存在的问题，不是过誉，而是偏低，甚至可说是抑之过甚。例如，六十年代成书的两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既没有指出山谷诗在宋代异乎寻常的影响，对庭坚的诗论近于全盘否定，对其创作成就则明显是以批评为主，稍有肯定，亦不过如曲终奏雅而已。这样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庭坚宋诗大家的地位。最近几年重新评价山谷诗的呼声引人注目，表明评价过低的状况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察觉。但是，近年重新评价山谷诗的一些论文，也还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例如，针对文学史教科书批评山谷诗缺乏现实内容，庭坚取消了诗歌的战斗作用，一些研究者因而特别强调庭坚关心民生疾苦，山谷诗富有“民主性精华”；等等。

应该说，在一千九百余首山谷诗中，描写民生疾苦、揭露朝政弊端的诗歌不是没有，个别篇章还不失为佳作，如《戏和答禽语》：

南村北村雨一犁，新妇饷姑翁哺儿。

田中啼鸟自四时，催人脱袴著新衣。

著新替旧亦不恶，——去年租重无袴著！

描写贫苦农民因租税过重，被盘剥到衣不遮体的地步。仅末句稍作点染，一种悲慨之情已呼之欲出。然而这样的诗数量很有限，且一般艺术成就不高。未能广泛描写现实生活题材无疑是山谷诗一个明显的缺陷。“不及世故”是庭坚的诗歌主张，也体现在山谷诗创作实践中。但是，不能仅仅因为山谷诗未容纳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就断言它内容贫乏，略无认识价值。在我看来，山谷诗中同样蕴含着社会的风云，只不过它是通过对庭坚心灵深处感情波澜的刻划和对友朋人生遭遇的感叹折射出来的，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是

那些传达出党争演为派系倾轧后政治气氛愈来愈恶劣的诗作,贬谪戎州所作的《次韻黄斌老晚游池亭二首》其二:

岑寂东园可散愁, 膠膠忧忧梦神游。
万竿苦竹旌旗卷, 一部蛙鸣鼓吹休。
雨后月前天欲冷, 身闲心远地常幽。
杜门谢客恐生谤, 且作人间鸚鵡游。

首联言漫步东园,聊以解忧,中间四句写贬所偏僻清冷,末二句点出贬黜以后那种战战兢兢、余悸犹存的心情,回过头去看中间两联,可知“杜门谢客恐生谤”指处偏远之地仍害怕人心不测、再加诬陷;读了最后一句,才体会出首联所谓漫步东园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又如《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其八:

闭门觅句陈无己, 对客挥毫秦少游;
正字未知温饱未? 西风吹泪古藤州!

诗是第一次贬谪遇赦后所作,分别怀念两位同样遭受党争牵连的友人陈师道和秦观,时秦已死、陈尚存。秦已死是死在贬所藤州;陈虽存,然沉沦微官,生计艰难。生死有别,遭遇同悲,正反映了派系倾轧之际士大夫所受打击的深重。在贬黜到天涯海角犹高唱“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苏轼笔下,似不容易体会当时气氛的严酷恶劣,山谷诗在这方面更真切地写出了个中真情,他的《跋子瞻和陶诗》前两句也许正道出当时大和陶诗、外表旷达冲淡的苏轼的心曲苦衷:

子瞻谪岭南, 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 细和渊明诗。

读了这几句,方能理解当时逐臣的旷达之态,无论是真是假,实在是一种别无抉择的人生排遣。我所看的诗歌中,当时似乎没有比山谷诗写得更沉痛悲切的了。

相对而言,山谷诗的艺术成就也许比它的内容更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山谷诗风格鲜明,但并不失之单调,以瘦劲峭拔为主,亦间见清丽流走,有凝重沉郁之作,也不乏清新轻盈之篇。晚年第二次流放途中所作的《书摩崖碑后》,是读了唐人元结作、颜真卿书的《大唐中兴颂》后感而发的。集大半生之经历磨难再来看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遂发有昏庸之君乃生叛将以致天下大乱的感慨,更对深忧国事民生之诗人不为世人理解而长叹:“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低头杜鵑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苕溪渔隐丛话》评为“杰句伟论,殆为绝唱,后来难复措词矣”,稍觉过誉,然笔触凝重,诗思沉郁,确系佳作。下面一首《题花光老为曾公衮作水边梅》则风格宛然有别:

梅蕊触人意, 冒寒开雪花。
遥怜水风晚, 片片点汀沙。

这首五绝的风调情韻都使我们想到唐诗,但庭坚七绝则每每发前人所未发,或构思奇特,于四句中写出一种丰富的想象联想,《六月十七日昼寝》:

红尘席帽乌靴里, 想见沧洲白鸟双;
马斲枯萁喧午枕, 梦成风雨浪翻江。

庭坚每言“独载扁舟向五湖”，向往归隐沧洲，遂因想成梦；梦中忽闻马咀豆稽之声，其声又与梦境打成一片，变成风雨江涛声浪——沧洲之趣顿为空幻！前人七绝写景、言情、议论无不备，但象这样描写人的意识流动的诗，此前还看不到。至于瘦劲峭拔之作，既是庭坚独辟的一种艺术风格，其中又蕴藏着庭坚的人生态度和追求，如《次韵黄斌老所画横竹》：

酒浇胸次不能平，吐出苍竹岁峥嵘。
卧龙偃蹇雷不惊，公与此君俱忘形。
晴窗影落石泓处，松煤浅染饱霜兔。
中安三石使屈蟠，亦恐形全便飞去。

全诗无一句情语，突兀而起；其中意象如苍竹、卧龙，均富力度感；极力渲染苍竹劲直挺拔，不得不以石压之使弯曲，也是富有力度感的描写。这首题画诗咏的竹，内含意蕴却是庭坚人生态度，苍竹虽为三石所压，屈蟠不伸，然忘却形骸，不以处境艰难为念，这无疑正是处在贬谪之中的庭坚自我观照。

除风格多样化外，庭坚形式上致力于“拗体”诗写作，不乏佳篇，《题落星寺》：
落星开土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
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
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
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

有意打破律诗和谐节奏，读来别具顿挫变化不测的美感。其它如长于比喻，善用典故，精于炼字等也是山谷诗艺术特点，这些地方前人多有论述，兹不展开讨论。

山谷诗在内容、艺术上都存在缺陷。侧重于修身养性之学使山谷诗有相当数量的篇章充盈着陈腐的道德说教，而且每每因此诗味索然，不堪卒读。苏、黄思想都具有杂揉儒、释、道为一体的特点，不过，苏轼好谈禅而不佞佛，喜老庄、道家之言而未厌弃建功立业，奉儒却不迂阔冬烘，融通三家而较少受其消极影响，东坡诗因此增添了不少亮色与活力；庭坚也许正好相反，他所受到的似乎主要是来自三家的消极影响，山谷诗中从释、道两家接受的是“明心见性”、“内视反听”修养方法，再以此求得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验认同，人生的进取向上精神于是被过滤殆尽，剩下的主要是玄思默想，山谷诗因此显得黯淡消沉。庭坚锐意创新使山谷诗比东坡诗读来更富新鲜感，然而遵循“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创新近于旧货翻新，因此山谷诗模拟前人痕迹反比东坡诗来得显著。锐意创新的另一负面是失之求奇，以改诗意晦涩，语僻难晓。

一九八四年五月初稿，八六年九月二稿。

（作者丁夏，中文系讲师）

注：

- ① 《渔洋诗集》卷二十二《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
- ②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题鲁直尝新柑帖》：“元祐末，有苏黄之称”。
- ③ 晁补之《鸡肋集》卷十四《用寄成季韵呈鲁直》
- ④ 《鸡肋集》卷五《次韵王宗正定国与苏翰林先生黄校书鲁直唱和》。

- ⑤ 周行己《浮沚集》卷八。
- ⑥ 王称《东都事略·黄庭坚传》参看《跋鲁直尝新柑帖》谓苏黄并称后士子“渐不平之”，又洪炎编山谷诗集，以《古风二首上苏子瞻》置卷首，言“以见鲁直受知于苏公，有所自也”（《山谷内集诗注》卷一引）。
- ⑦ 《论作诗文》，《豫章黄先生之集·别集》。
- ⑧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
- ⑨ 《宋诗选注》一三五页“汪藻诗小序”。
- ⑩ 《谈艺录》四七七一四八六页言元好问“于宋诗人中，只诵说东坡，勿屑江西宗派，指斥山谷”而诗中“稗贩山谷而沿误传讹”；又四九七一四九八页合赵秉文等学山谷体。金人论诗重苏抑黄，参见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五“黄不如苏，不必辨而后知”。
- ⑪ 翁方纲《斋中与友人论诗》。
- ⑫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独盛。”北宋大家名家如梅、欧、王，在南宋学者均不及黄，参见元好问《论诗》：“讳言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谓梅诗“自世竞宗江西，已看不入眼”，刘将孙《王荆公诗序》：“江西派接而半山诗几不复传”。
- ⑬ 《读黄诗》：“两苏而下秦晁张，闭门觅句陈履常”。
- ⑭ 宋人每以韩文、杜诗并举，而对韩诗少所许可，参见《后山诗话》、《临汉隐居诗话》载黄庭坚、陈师道、沈括言：“韩以文为诗，故不工尔。”
- ⑮ 《石屏诗集》卷七《论诗十绝》：“举世吟哦推李杜，世人不知有陈黄。”黄、陈之称在杨万里集中已提到，《跋徐恭仲省干近诗》：“黄陈篱下休安脚”。
- ⑯ 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引张耒《评鲁直诗文》。
- ⑰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诗派·黄山谷》。
- ⑱ 《中国文学史》第二册第五章“宋代文学”。
- ⑲ 参观赵令畴《侯鯖录》所记苏轼诗中文字游戏，又清赵翼《瓯北诗话》谓“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 ⑳ 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王荆公晚年诗体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参见《王直方诗话》、《冷斋夜话》论“造语之工，至荆公、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王、苏、黄并举。《后山诗话》更云：“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独许半山诗精工过人。
- ㉑ 吕说见其《江西宗派图序》，谓庭坚“抑扬反复，尽兼众体”；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谓山谷诗学杜而未得精髓；胡子《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谓山谷诗“清新奇巧，是其所长，谓抑扬反复，尽兼众体，则非也。”
- ㉒ 如《书湖阴先生壁》中“排闥”取自《汉书》，《醴醴金沙二花合发》中“丹白”引自《直诰》。参见《石林诗话》卷中记安石论诗当从“汉人语对汉人语”，不能参以异代语；又只能用“梵语对梵语”。
- ㉓ 《风月堂诗话》卷下引参寥评东坡诗语。
- ㉔ 《和蒲泰亨四首》其一，《山谷别集诗注》卷下。
- ㉕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萎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其实不惟士大夫急欲改变现状，当时两个皇帝——英宗、神宗也具有同样的心态。参见《朱子语类》卷一三〇谓英宗“有性气，要改作”，神宗“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
- ㉖ 元丰八年苏轼《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又被侍御史贾易加上“怨诽先帝，无人臣礼”；继“乌台诗案”后，又有“蔡榷诗案”，故时人陆佃说当时“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讪人为风采”（《宋

史·陆佃传》)。

- ⑳ 如《按田》、《同尧民游男源庙廖献臣用马陵二字赋诗》、《七大蒙笼》、《劳坑入前城》、《古诗二首上苏子瞻》、《戏和答禽语》等,总数不到十首。
- ㉑ 《次韻子由绩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国》,《山谷内集诗注》卷二。
- ㉒ 《和邢惇夫秋怀十首》其四,同上卷四。
- ㉓ 《奉和文潜赠无咎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韻》八首其七,同上。
- ㉔ 《书鲁直诗后》,《东坡题跋》卷二。
- ㉕ 《与洪驹父书第二首》、《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
- ㉖ 《后山诗话》:“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者不可不慎也。”
- ㉗ 蔡绦《西清诗话》。
- ㉘ 陈善《扞虱新语》,参看杨时《龟山语录》言东坡诗“只是讽刺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
- ㉙ 据《明道杂志》,“乌台诗案”后,苏轼“作诗每为不知者咀味以为讥讪”,对苏轼诗文的批评,在南宋仍然集中在“好讥刺”这一点,《鹤林玉露》即言“东坡文章,……其短在于好讥刺。”而庭坚的主张则多获赞同,严羽对山谷诗虽不满,《沧浪诗话·诗辨》却云:“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戴复古《论诗十绝》“时把文章供戏谑,不知此体误人多”,也反对苏轼的“嬉笑怒骂”。
- ㉚ 《与徐师川》:“治经以探其本,行止语默,一一规模古人,至于口无择言,身无择行,方可师心自行耳。”《与徐师川书》“诗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
- ㉛ 《颐轩诗六首》其六。
- ㉜ 《陈留市隐》。
- ㉝ 《次韻杨明叔》。
- ㉞ 《送王郎》。
- ㉟ 周必大《分宁县学山谷祠堂记》。
- ㊱ 《象山集》卷九《呈程师》。
- ㊲ 《川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外集补》卷二。
- ㊳ 《赠谢敞,王博喻》,同上卷四。
- ㊴ 《赠高子勉四首》其三,《内集》卷十六。
- ㊵ 参看《王直方诗话》记庭坚言作诗“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经曲折之致意乃成章耳。”
- ㊶ 庭坚主张师法前人范围甚广,上自《诗经》、楚辞,下至“唐律”,而尤以陶渊明、杜甫为重点,《赠高子勉四首》其二“拾遗句中有限,彭泽意在无弦”,即指兼采陶、杜之长,融为一体。
- ㊷ 《跋高子勉诗》特别说到杜诗“置一字为关门之键”,这“一字”也就是“句中有眼”。
- ㊸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引张耒语。
- ㊹ 张耒《柯山集》卷五《赠无咎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韻》称庭坚“句中握奇律”,《五总志》亦称山谷诗“句律超妙入神,于诗人有开辟之功”。
- ㊺ 《后村诗话》后集卷二引游默斋《序张晋彦诗》。
- ㊻ 王安石主张“用事须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正是后来山谷诗“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的“妙法”,因此《冷斋夜话》讲“换骨夺胎”法,举王安石诗为例;《艇斋诗话》也说王安石如何从杜诗中“夺胎换骨”,苏轼则号称“点瓦砾为黄金”,为“点铁成金”说开了先声。

(下转第 78 页)

彰及弟子程朝钰、程朝仪兄弟录之。生平著述，百十种，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惜无力尽刊，已刊者，实不过二三十种而已。朱骏声死后，这批手稿归由朱孔彰、程朝仪等收藏整理。后传至其孙朱师辙手里。民国三十六年（1947），朱师辙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曾发表《吴郡朱氏两代遗著征刊启》，“深期富有资财，当代贤达，商成盛举，此则师辙所盼祷也。”很可惜，这批遗著当时未曾刊行。解放后，朱师辙仍多方呼吁，由于种种原因，亦未有结果。朱师辙死后，这批朱氏三代遗稿辗转归浙江图书馆收藏。近日始闻，浙江古籍出版社不惜重金，决定以《三隐庐丛稿》为书名（朱骏声号石隐，朱孔彰号半隐，朱师辙号允隐），组织班子整理出版朱氏三代遗著，这实在是文化出版界的盛举，若九泉之下的朱氏三代有知，一定会感到宽慰的。

1985年5月草于杭州

（作者刘跃进，中文系教师）

（上接第67页）

- ⑤④ 如《奕棋呈任公渐》里“湘东一目诚甘死”，“湘东一目”语出《南史》，原指湘东王盲一目。这里借指下围棋，围棋需两个“眼”才能活了，“眼”、“目”同义，故借“湘东一目”言围棋只剩一“眼”，输局已定。此即“用其语而不用其意”。
- ⑤⑤ 如《病起荆江亭即事》八首其八“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未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全诗句法仿效杜甫《存殁口号》：“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
- ⑤⑥ 如《读太真外传》五首其二：“扶风乔木夏阴合，斜谷铃声秋夜深。人到愁来无会处，不关情处亦伤心。”模仿白居易《和思归乐》诗意：“峡猿亦无意，陇水复何情？为人愁人耳，皆为断肠声。”
- ⑤⑦ 参见《中山诗话》记时人讥“晚唐体”诗人“偷古人诗句”，“西昆体”诗人遭优人讥笑，指为“搯义山”。
- ⑤⑧ 吴萃《视听钞》记南宋人学山谷诗流于“字字剽窃，万首一律”。
- ⑤⑨ 吕本中《童蒙诗训》于苏、黄均言“广被众体”，“包括众作”，而独许庭坚“本以新意”。
- ⑥⑩ 《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韻道之》，《山谷内集诗注》卷五。